

● 李宇明

论

语言

与

文化世界

我们的身体生活在客观世界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而，我们的心灵却是生活在文化世界中。人类的整个历程，是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历程。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称为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客观世界在人脑的反映。人们在社会中生活，通过各种联系手段沟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成员对客观世界的整体认识，构成了某一民族、某一社区的文化世界，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传留给后代。因此，文化世界不是指某个人的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集体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

“中国”一词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有了。当时“诸夏”居住在黄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一些地区，四方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中国”指的是诸夏居住的地方。后来，“中国”成了一个国家的名称，在古人的文化世界中，中国处于天地之中央，正如宋代石介的《中国论》所云：“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看到了一张这样的地图：大明帝国的十五个省，被画在地图中间部分，四周是海，海中有若干小岛，填写着当时中国人所说的一些国家的名字，这些小岛总面积加起来还不如中国最小的省份的面积。当利玛窦展示出有经纬线、赤道、回归线的地图时，中国士大夫们看到中国的面积竟如此之小，且在东方一隅而不在全图中心，竟认为是“以其邪说惑世”。而今天，我们大概都可以接受中国不在地的中央而是在东方一隅的看法。由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看法可以看到古今文化世界的差异。

一、语言与文化世界的建构

(一) 语言在建构文化世界中的作用。文化世界的建构，从理论上讲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对客观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把这种认识进行传播交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思维的过程。当把思维过程的成果用一定的物质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某一社团中进行传播交流，便形成了某社团对于世界的集体认识，亦即形成了该社团的文化世界。因此我们要认识语言在建构文化世界中的作用，就必须观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巩固和传播思维成果中的作用。

1、语言是思维的最重要的工具。思维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任何精神活动都必须凭借一定的物质才能得以进行，因此思维也必须使用一定的物质工具。过去，不少人认为思维只有抽象思维，而思维的工具只有语言。因此，曾经得出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的结论。美国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华生把这种结论简炼地概括为：言语是出声的思维，思维是

无声的语言。但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不用语言的思维现象，比如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给数学家哈达马德的信中说：“在我的思维机构中，书面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地’再生组合。……上述的这些元素就我来说是视觉的，有时也有动觉的，通用的文字或其他记号只有在第二阶段才能很费劲地找出来。此时上述的联结活动已经充分建立，而且可以随意地再生出来。”篮球运动员能以最合适的速度、力量和动作把球投入篮中，棋坛大师可以在一两秒钟内就在众多可能性中走出最佳的一步棋。这些都说明思维并不只是凭借语言。正是有这种思维现象的存在，于是有人就不承认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甚至还极端地认为语言干扰纯正的思维。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4~1753）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宣称：“我不论考察任何观念，都要努力来观察赤裸裸的观念，而且要努力把因经常使用而与它们常相关联的那些名称摆脱于我的思想之外。”德国哲学家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 1833~1921）说得更直接：“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么他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都有偏颇之处。

当代科学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三种类型：技术思维、形象思维和概念思维。技术思维是依靠各种直观动作等作为工具的思维，运动员在球场上的竞争，机修工在维修机械时的思考，机械工程师面对设计图表、构造模型时的构想等，都属于技术思维。形象思维是凭借表象进行的思维，如文学创作，艺术家的绘画、音乐、舞蹈设计，电影师的蒙太奇剪接等，都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概念思维又叫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它是凭借概念来进行判断、推理。由于概念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因此概念思维的工具是语言。

当然，对于思维的如上分类，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对于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来说，往往不是只进行单型思维，而是多种思维类型交替、混合使用。进行文艺创作时，虽然主要使用形象思维，但也不可能不用概念思维。机械工程师在工作时主要进行的是技术思维，但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形象思维和概念思维。当然，当人进行概念思维时，也常掺进技术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成份。正是思维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因此，不能说思维可以不凭借语言，也不能说思维只可以使用语言。

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经过大量试验证明，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是人具有第二信号系统，可以通过语言来进行思维。因此他说人是词的动物。的确，如果说一些高级动物也有思维的萌芽的话，它们主要有的是低级的技术思维和形象思维，而没有概念思维。当然人类的技术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不能同动物相提并论的。人类进行最多的思维是概念思维，人类最重要的思维也是概念思维。因此，尽管程序语言、公式和符号、技术思维语言、拼图语言、音乐语言、舞蹈语言、绘画语言、蒙太奇语言等都可以充当思维工具，但是，只有自然语言才是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其他的思维工具是无法同它相比的。

当然，用于思维的语言也许同人们平时用于交际的语言有所差异，但这种用于思维的语言（内部语言）必然是用于交际的语言（外部语言）的内化。当人们长时间的思考问题时，常觉得喉部干燥，这说明人们在思维之时发音器官也在作小幅度的运动。科学家在人的发音器官的敏感部位装上电极，发现在默算时的电波图形同口算时的电波图形非常相似，这说明人们默算时也在使用口算时的语言。儿童语言学家发现幼儿常常是一边玩玩

具，一边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正是幼儿用于思考的语言。由于幼儿还不会沉思默想，所以只能用外部语言来思维。等到幼儿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这种用于思维的外部语言便转化为内部语言。这种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儿童就学会了沉思默想，并且这种自言自语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其实成年人虽然主要用内部语言思维，但是在解决非常棘手的难题时，也往往会发出声音，使用外部语言。许多断断续续的梦话，也是内部语言的外现，这些事实表明，内部语言同外部语言具有相同的品格，证明人类在进行概念思维时是在使用语言。

2、语言是巩固和传播思维成果的最重要的物质形式。正如思维不能凭空进行一样，思维的成果——思想，也不可能赤裸裸的存在，它必须附着于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既然语言是思维的最重要的工具，那么语言也是固定思想最重要的物质形式，虽然语言并不是固定思想的唯一物质形式。思想通过语言的固定，使得思想具有了可以感知的物质形式，因此语言可以使思想物质化。

不仅如此，语言在使思想物质化的过程中，还使思想进一步清晰化。当一种概念还没有找到表现它的合适的语言形式时，还是模糊的，甚至图表、公式、符号这些物质形式，只有通过语言的解释，也才能清晰明朗。因此，语言不仅赋予思想以物质形式，而且还帮助思想的最后形成和完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说到底仍是一种模糊的思想。

当思想形成之后，就可以通过它所依附的物质形式进行传播交流，从而使个人的思想成为集体的财富，为全社会分享。作为传播交流思想的媒体可以是手势、号角、符号、音乐、图画、舞蹈等等，但是，这些媒体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交际广度和深度都难以同语言相比，大文豪罗曼·罗兰曾经指出：“而音乐，虽然人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音乐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既然语言是思维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巩固和传播思维成果的最重要的物质形式，那么，语言在文化世界的建构中就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曾经说过：“应该把语言作为形成文化的力量来研究，因为正是语言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这段话用来评定语言在文化世界的建构中的作用，可以说是较为深刻的。

(二) 前语言文化世界和语言文化世界

人类大约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过去，人们多认为语言是人类完成从猿到人转化的一个标志，因此，人类从一开始也就具有有声语言，语言也该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生物学、人类考古学、心理学、脑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先后对语言起源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就是语言大约产生在距今四五万年的时期。

从早期猿人到现代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晚期智人的脑容量约为1400毫升，现代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500毫升。我们知道，有声语言是由音义两个方面构成的，而要产生一定的语义必须有一定的发达的头脑，而头脑的发达程度同脑容量有一定的关系。比较晚期智人和现代人的脑容量，科学家们推断晚期智人大概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思维。美国科学家利伯曼根据解剖学原理，曾用电子计算机模拟属于早期智人的尼安德特人的声音系统进行试验，结果表明尼安德特人仍

无法清晰地发出〔a〕〔i〕〔u〕这样的最基本的元音，而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这三个最基本的元音是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因此也是很原始的。如果连这三个最基本的元音都不能清晰发出，那么就很难产生有声语言。所以有声语言到了晚期智人时期才有产生的可能。

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晚期智人之后，人类很快地步入了新石器时代，社会突然间加快了前进步伐，这同语言的产生一定很有关系。因为语言这种高级的交际工具把异时异地人的智慧积累了起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大量的研究表明，语言大约只有四五万年的历史。在语言产生之前，人们也需要有一定的交际工具，这种交际工具是手势、动作、表情和一些比动物复杂的叫声。这种原始的交际工具勉强可以满足当时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就是从原始的叫声发展而来的。

在语言产生之前，人们也在能动地去认识世界，而且逐渐地积累这种认识。因此，那时也有自己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世界我们称为前语言文化世界。与之相对，我们称语言产生后的文化世界为语言文化世界。前语言文化世界是一种极为原始的、低级的文化世界。当时人们思维是一种凭借情景、手势、动作、表情、呼叫等工具的思维，因此思维的水平很低。思维的成果也只能靠这些物质形式来巩固和传播，所以当时的思想也是十分模糊粗疏的，传播交流也是极为有限的。正因如此，前语言文化世界根本无法同语言文化世界相比。所以本文所谈及的文化世界，主要是指语言文化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前面关于语言在文化世界的建构中的作用的论述才是正确的。在前语言文化世界中当然无法谈及当时还没有产生的语言的作用。

二、语言与文化世界的传承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建构起来的文化世界基本上都储存在语言之中，因此大致可以说，文化世界就是一个概念系统。后代人通过学习前代人使用的语言，也就同时学习了前代人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主要是通过语言传承给后人的。

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一定的文化世界所刻画的“世界图景”。比如夜晚的星空，群星闪烁，人们对群星的认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星座。在德语中，有大熊星座、小熊星座、金牛星座、双子星座、牧夫星座等等。而古希腊则把星座分为四十八个，并且都按希腊神话中的形象命名。我国早在公元三世纪就已把星空划分为二百八十八个星座。诸如此类的划分，同星体之间的物理联系相去甚远，不属于一个星系的星体被人们的认识拉扯到了一起。因此古代的星座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是人们对星空的感性认识的条理化。其实，古希腊人、古日耳曼人和古中国人所看到的星空大致是相同的，但是都划分为不同的星座，表现为不同的世界图景。这种现象可以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切分的人为性的一个证据。

当后代人学习语言时，也就把该语言所记录的文化世界接受了下来，亦即把不同文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接受了下来。就此而言，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图景，并强制后代以此世界图景也看待世界，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文化世界称之为语言世界。

人类在不断地认识世界，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世界。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巨大影响，首先我们从语言中继承了祖先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

界就象一张网一样。我们随时随地地带着这张网来罩盖客观世界。当对世界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企图将这种新认识装进这张网里。比如我们对自然界的生物用界、门、纲、目、科、属、种分类，这种分类系统就是一张网，当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时，总是要极力把它填进已有的分类系统中。正如美国的语言学家沃尔夫所言：“我们研究自然界是按照我们本族语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来研究的。从现象世界中分离出来的范畴和形式，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这些现象中的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恰恰相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印象的洪流，这些印象正是由我们的意识所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工作主要是借助于铭刻在我们意识中的语言体系来进行的”。

其次，我们不仅接受了前辈的语言文化世界，而且我们还被强制性地接受前辈的思维工具——语言——来进行思维。工具和产品之间是有联系的，某种工具适应于生产某种产品，而不适应于生产另一种产品，正如木工的锯子、斧头和刨子一样。由于不同的语言携带着不同的文化世界，因此，当我们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维时，就必然受到不同语言特点的制约，因此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比如光谱对于人来说，其感知应该说是相同的，因为医学已经证明，人类对于光的感知在神经生理方面没有多少差异。但是，不同的语言对于光谱的切分却有很大差异。汉语把光谱切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段，英语则切分为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六段，有的语言切分成五段，有的语言切分为三段甚至两段。即使切分段数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各段的起迄点也有差别。比如英语的red比汉语的赤范围要窄，而英语的Purple则比汉语的紫范围要宽。这就是说，有些汉语认为是红色或蓝色的，英语都认为是Purple。当某种语言中没有某颜色词时，人们对该颜色的认识就会发生一定困难。比如利比里亚的巴萨语，只把颜色分为暖色和冷色，那么使用巴萨语的人很难象汉族人那样去细致地区分出不同的颜色。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使用巴萨语的人不能够通过教育分辨出各种颜色，但辨认起来具有相当的困难也是事实。这种情况表明语言影响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

再如，美洲的爱斯基摩语中用15个名词来表示不同形态或下落到不同地点上的雪，阿拉伯半岛的贝督因人对于各种各样的骆驼都有不同的叫法，泰国北部的甸族，对于不同生长期的稻子和不同加工过程的稻谷都赋以不同的名称，英语表示不同类型的小偷竟有32个词，我国古代对牛的分析极为精细，从公母、大小、年龄、毛色、毛长、角的形态、体态、功能以及肉食风味等不同的角度来命名，有关表示牛的词竟多达30多个，这对于当代汉族人来说，对于雪、骆驼、稻、小偷、牛等要区分得如此精细是相当困难的。这种情况必然影响着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思维精度、思维速度以及思维之后所得到的世界图景。当然，爱斯基摩人虽然用15个名词来表示各种各样的雪，但却没有“雪”这个概括性词语，这也必然影响到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本质认识，影响到他们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维要想突破原有语言的限制，就必须在思维时增添新的语言成分，比如一些新的词汇和语法成分，从而去适应新的思维和新的认识。这样，语言就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人类的认识能力也就不断提高，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得到了新的发展。如果不增加新的语言成分，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就只能在原有的文化世界中徘徊。比如操巴萨语的人要认识红、橙、黄这些颜色，而不是只停留在暖色的思维水平上，他们就必须添加红、橙、黄这

样一些新词语。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文化世界是通过语言强制性地“遗传”给后代的。语言不仅把某文化特有的世界图景传给后代,而且,还把前辈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角度以及思维的工具传给后代,从而影响到后代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维。如此可见语言在文化世界传承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三、语言与文化世界的碰撞

从以往人类的历史看,有的文化世界是独立存在和传承的,起码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独立存在和传承的,而有的文化世界则是同其他文化世界不断发生碰撞而相互影响发展的。而且尤以后者为最常见。特别是近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文化世界相互之间的碰撞影响也越来越激烈。

汉语文化世界就是在同许多文化世界的激烈撞击中发展起来的。自夏至秦,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夏文化就同“四夷”文化发生了广泛的接触。汉代以后,西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曾对汉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吕叔湘先生曾经研究过南北朝时期以佛教词语作名字的现象,从当时人的命名用字上就可以看出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明代以后,西洋文化、北洋文化和东洋文化都对而且现在仍在对汉文化发生着碰撞,产生着影响。在几千年的文化撞击之中,汉文化也对其他文化发生了而且仍在发生着深刻巨大的影响。

文化世界的接触当以语言的接触为先导。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人通过活动从自身之中创造语言,人又通过这种活动把自身置于语言的统治之下。每种语言都在操该语言的民族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子,只有你进入另一个圈子时,才能跳出这个圈子的范围。”文化世界的接触,就是不同“圈子”的交或并。这种交或并,只有通过语言的接触甚至融合才能实现。因为语言是文化世界的记录,只有掌握了他族的语言,才能了解他族的文化。当然这是指社团的总体而言,就一个人来说,他可以通过翻译介绍的文章来了解,而不一定要掌握他族语言。但是,既有翻译,有介绍,社团之间就一定得有掌握对方语言的人。其实语言与语言的翻译很难达到准确,有些语言成分甚至是不可翻译的。因此,要准确地了解他族文化,归根到底还是要掌握他族的语言。比如汉语中的“礼”“义”和英语的“费厄泼赖”是很难对译成他种语言的。

不同文化世界的撞击,是促进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文化圈子闭关自守,即使鸡犬之声相闻,也仍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这种文化圈子肯定发展缓慢,甚至自取灭亡。由此可见语言在文化世界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由于语言记录着整个文化世界,因此它是文化世界建构的最必要的条件,是文化世界传承和发展的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文化世界相互影响碰撞的先导,因此语言与文化世界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语言对于文化世界的影响是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 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3. 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4.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

【作者简介】 李宇明(笔名:眸子),男,35岁。1981年获郑州大学文学学士,1984年获华中师大现代汉语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现代汉语教研室和理论语言研究室副主任。共有著述二百余万言。**(责任编辑 董山东)**